

抗日战场上的自行车

1

从上世纪60年代的黑白抗战片,到当代某些“撕鬼子”的“神剧”,骑自行车常常是汉奸们的标配操作。

相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倒是在影片里徒步行进,齐刷刷跟在汉奸的自行车后头……

那么在真实的抗日战场上,自行车的存在感真有这么强?

关于这个问题,抗日英雄最有发言权。

比如1943年时,晋察冀军区分区警卫连战士陈永福,就凭着一辆自行车,上演了一场神操作。

2

这年十六岁的陈永福,受命化装进入游击区执行任务,却不幸被日本宪兵抓了做民夫。

机灵的他凭着一手好厨艺,轻松获得了满城日军据点宪兵队长金山的信任。

有一天晚上,日本宪兵队的大部分士兵都出去扫荡,陈永福趁机给留守据点的金山等特务汉奸做了一桌好菜,“伺候”着这帮人喝得酩酊大醉后,然后拿出刀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杀”,把整个据点的敌人迅速杀光后,再换上金山的日本军服,骑着金山的自行车快速离开。

发现据点全死光后的敌人在后面狂追,陈永福在前面猛踩车子,双方边追逐边展开激烈枪战。

听到枪声的八路军侦察连及时赶到打退敌人,还抓了两个伪军俘虏。

所以自行车在那时,确是重要装备。

3

其实,虽然在今天,自行车只是普通生活用品,但放在当时,它却是顶级工业品。

自行车的制造门槛极高,中国本土一直到1936年,才有了第一家自行车厂。

一直到1949年时,中国全国的自行车产量也只有1.5万辆。

抗战爆发前的广州,平均每二百人才拥有一辆自行车。

而在抗战时期的上海,一辆普通自行车的价格,相当于工人三个月的工资。

这样的“豪奢品”,放在抗战战场上,也是刚需物资。

二战时期的日本,就高度重视自行车的机动作用。

特别是在东南亚战场上,大量装备自行车的日军,以快速的穿插将英军包了饺子。

而在侵华战场上,日军也大量使用自行车。

比如在苏北淮海地区,日军的情报士官就常组成七八人一组的小队,骑自行车收集情报。

好些情报小队被新四军消灭后,自行车也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。

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里,就陈列着我军缴获的自行车。

甚至,1988年时,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陈列的自行车“车主”——当年被我军打跑的日本兵,还曾专门跑到纪念馆,在这辆自行车面前痴痴凭吊了一番,仔细回忆了被缴车的经历。

最后,还要求纪念馆归还他的自行车。

这种无耻的要求也能说出来,真是鬼子。

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鬼子来说,丢一辆自行车就是桩“肉痛”的事儿。

4

那么,这么宝贵的自行车,日军真的愿意分派给汉奸们使用吗?

许多抗日名将的回忆说,确实是这样。

特别是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,日军每次扫荡时,还专门组成汉奸自行车队,给日本大部队开路。

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慷慨?

首先要弄清一个事实:汉奸们组团骑自行车不假,但日军行军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汽车。

当时的日军,其机械化水平比起中国军队,是绝对优势。

华东和华北战场上,日军占领的主要大城市和交通线,因此其行军的主要方式,正是乘坐汽车。

以1942年的“五一大扫荡”为例,当时动用五万多兵力的日军,其汽车多达800辆,也就是每60多名日军,就能分到一辆汽车。

而在关键战役里,越是日军精锐部队,其汽车的配备比例也就越高。

比如1939年冀南反扫荡战役

时,当八路军在威县设伏,歼灭一股200人的日军后,日军随即展开反扑,2000多日军乘坐70辆汽车向八路军凶猛扑来。幸亏八路军及时转移,叫日寇扑了个空。

但在更多的战斗里,面对乘坐汽车的日军,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也常吃亏。

1938年6月的町店战役里,八路军344旅包围了数十辆满载日军步兵的汽车。

部队趁日军停留休息时发起进攻,但反应过来的日军,迅速依托汽车构筑防御,甚至趴在车底对八路军进行射击。

在击退八路军攻势后,他们更

赖机械化。

如果失去了汽车、坦克等装备,“就失去作战的信心”。

所以,这么金贵的汽车当然不能给汉奸用,但为了保证汉奸的机动性,日军也只能给汉奸们配上自行车。

特别是大扫荡时,这些骑自行车的汉奸们,就要负责给日军“打前站”。

每当八路军要设伏袭击日军时,战士们首先看到的,就常是“骑自行车的便衣(汉奸)”。

此外,骑自行车的汉奸们由于对本土很熟悉,在那些敌我顽犬牙交错的地区,他们自然也更擅长骑



凭着汽车的机动力冲破八路军包围圈。

经过半日激战,八路军虽然摧毁了二十多辆日本汽车,却也付出了伤亡二三百人的代价,眼睁睁看着残敌突围……

而在抗战相持阶段里,那些如毒牙般嵌入沦陷区的各个日军据点,也基本都是靠汽车来联系。

每当八路军进行拔除据点的战斗时,日军更常以汽车快速运兵增援,甚至对八路军进行反扑。

而当日军每次大扫荡开始前,以抗日名将杨成武的话说,日寇也会迅速在山区里,修起简易的汽车路。

八路军也不甘示弱,常常组织精干力量,专打日寇的增援部队……

5

但抗日名将徐海东说,日军虽然作战凶残,但一大弱点就是太依

自行车四处刺探渗透,成了臭名昭著的“汉奸自行车队”。

当然,由于汉奸们大多数不能打,侵华日军也每况愈下,所以到了抗战中后期,越来越多的自行车,就成了人民军队的战利品。

甚至在敌后情报和游击斗争中,自行车也成了利器。

晋察冀老乡们的一个好习惯,就是每当我军情报人员进村后,他们会迅速扫掉自行车留在地上的轮印,以防止敌人跟踪。

而随着人民军队缴获的自行车越来越多,到了抗战最后时段,自行车更成了许多首长的标配。

同样是名将杨成武,在回忆1945年大反攻时,就有一幅难忘的画面:当部队浩浩荡荡,开始对日军展开夏季攻势时,杨成武将军“带着司令部的参谋人员,骑着自行车夹杂在行军队伍之中……脸上泛着红光”。

这一切,已经预示着一场伟大胜利的到来。

西方文化典故

乌托邦

源出希腊文,意即乌有之乡。

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《乌托邦》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,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,生活用品按劳分配,人人从事生产劳动,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的研究和娱乐,那里没有酒店、妓院,也没有堕落和罪恶。

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。

第二十二条军规

源出美国作家约瑟夫·赫勒创作的黑色幽默小说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。

这部小说太有影响了,以至于在当代美语中,“第二十二条军规”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,使用频率极高,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、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、难以逾越的障碍,表示人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,或者是一件事陷入了死循环,或者跌进逻辑陷阱等等。

奥吉亚斯的牛圈

出自希腊神话。奥吉亚斯是海神的儿子,他养了无数的牛,粪秽堆积如山。

比喻累积成堆或肮脏腐败的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布利丹毛驴

出自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利丹的寓言。

有一头饥饿毛驴站在两捆同样的干草之间,居然不知吃哪边的干草才好,结果饿死了。

比喻那些优柔寡断的人。

